



西安交通大学

(载 卷 社 允 署 刊 敏 早 故 器 算 理 强)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附 译 卷 刊 存 编 志 刊 社 葬 强)

阅 读 卷 卷 是 汉 城 刊 出 卷 译)

· 学术文库

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李树茁 姜全保 摇著
〔美〕费尔德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第一章 摇引言	轱员
摇第一节 摇问题的提出	轱员
摇第二节 摇人口社会后果	轱原
摇第三节 摇研究意义	轱苑
摇第四节 摇本书结构	轱怨

第一部分 摇历史和现状

第二章 摇出生性别比	轱猿
摇第一节 摇背景	轱猿
摇第二节 摇出生性别比总体状况及趋势	轱远
摇第三节 摇区域出生性别比	轱园
摇第四节 摇出生性别比的民族差异	轱远
摇第五节 摇本章小结	轱苑

第三章 摇偏高女孩死亡水平	轱怨
摇第一节 摇背景	轱怨
摇第二节 摇历史趋势	轱起
摇第三节 摇城乡差异	轱起
摇第四节 摇民族差异	轱猿
摇第五节 摇区域差异	轱源
摇第六节 摇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偏离度的动态变化	轱原
摇第七节 摇本章小结	轱猿

第四章 摇园世纪“失踪女性”数量的估计	轱缘
摇第一节 摇背景	轱缘

插图第二节插图方法和数据	插图
插图第三节插图“失踪女性”数量的估计结果	插图
插图第四节插图本章小结	插图
第五章插图女孩生存国际比较	插图
插图第一节插图背景	插图
插图第二节插图数据和方法	插图
插图第三节插图性别比和死亡水平的变化趋势	插图
插图第四节插图男插图-插图女孩死亡水平比较	插图
插图第五节插图危机和性别歧视对女孩生存的影响	插图
插图第六节插图本章小结	插图

第二部分插图原因和机制

第六章插图男孩偏好和人工流产	插图
插图第一节插图背景	插图
插图第二节插图研究框架	插图
插图第三节插图数据与方法	插图
插图第四节插图分析结果	插图
插图第五节插图本章小结	插图
第七章插图婚姻形式和男孩偏好	插图
插图第一节插图背景	插图
插图第二节插图数据与方法	插图
插图第三节插图结果	插图
插图第四节插图本章小结	插图
第八章插图农村男孩偏好文化的传播	插图
插图第一节插图背景	插图
插图第二节插图文化传播和演化理论	插图
插图第三节插图调查	插图
插图第四节插图主要研究结果	插图
插图第五节插图本章小结	插图

第九章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性别偏好	205
第一节 背景	205
第二节 研究设计	206
第三节 数据与方法	207
第四节 分析结果	208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09
第十章 城乡人口流动和城镇出生性别比	210
第一节 背景	210
第二节 研究设计	211
第三节 数据与方法	212
第四节 分析结果	21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14
第十一章 个人、家庭和儿童生存	215
第一节 背景	215
第二节 数据与方法	216
第三节 按个人与家庭因素的儿童生存性别差异	217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18
第十二章 儿童生存的微观研究	219
第一节 背景	219
第二节 调查设计、执行与数据质量	220
第三节 主要结果	22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22

第三部分 后 果

第十三章 人口后果	223
第一节 背景	223
第二节 性别歧视的成因和后果	224
第三节 针对性别歧视的公共政策反应	225
第四节 政策模拟方法	226

摇第五节摇模拟结果	摇原猿
摇第六节摇本章小结	摇原远
第十四章摇“婚姻挤压”	摇原愿
摇第一节摇背景	摇原愿
摇第二节摇方法和数据	摇原园
摇第三节摇结果与讨论	摇原源
摇第四节摇本章小结	摇原愿
第十五章摇“婚姻挤压”的国际比较	摇原园
摇第一节摇背景	摇原园
摇第二节摇中国、韩国和印度的家族和婚姻体系	摇原园
摇第三节摇数据和方法	摇原员
摇第四节摇配偶可获得性和“婚姻挤压”	摇原原
摇第五节摇性别歧视历史趋势的社会后果	摇原怨
摇第六节摇本章小结	摇原猿

第四部分摇实摇摇践

第十六章摇“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	摇原苑
摇第一节摇项目背景	摇原苑
摇第二节摇项目设计	摇原怨
摇第三节摇项目实施	摇原圆
摇第四节摇项目效果与影响	摇原远
摇第五节摇扩展	摇原愿
摇第六节摇几点认识	摇原员
参考文献	摇原猿
后摇记	摇原圆

Contents

悦寡贵贱川岳附列卷总卷上	轲员
1.1 Why Study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China	轲员
1.2 Population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轲原
1.3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轲范
1.4 Structure of the Book	轲怨

Part 1 Historical and Present Situations

悦寡贵贱川岳杂著卷总卷中	轲员
2.1 Background	轲员
2.2 Past and Present SRB in China	轲远
2.3 Regional SRB	轲园
2.4 Ethnic Group Difference in SRB	轲匹
2.5 Summary	轲范

悦寡贵贱川岳杂著卷总卷下	轲员
3.1 Background	轲怨
3.2 Historical Trends	轲园
3.3 Urban-rural Differences	轲圆
3.4 Ethnic Group Differences	轲员
3.5 Regional Differences	轲原
3.6 Dynamics of SRB and Excess Female Child Mortality	轲原
3.7 Summary	轲员

悦读藏办、报表

研究背景

转页

8.1 Background

转页

8.2 Theory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转页

8.3 The Survey

转页

8.4 Results

转页

8.5 Summary

转页

悦读藏办、报表

研究背景

转页

9.1 Background

转页

9.2 Research Design

转页

9.3 Data and Method

转页

9.4 Results

转页

9.5 Summary

转页

悦读藏办、报表

研究背景

转页

10.1 Background

转页

10.2 Research Design

转页

10.3 Data and Method

转页

10.4 Results

转页

10.5 Summary

转页

悦读藏办、报表

研究背景

转页

11.1 Background

转页

11.2 Data and Method

转页

11.3 Gender Difference in Child Survival by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Factors

转页

11.4 Summary

转页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男女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和权益的维护，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女孩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将“持续歧视女孩并侵犯女孩的权利”作为妇女问题的12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并制定了改善女孩生存和发展的具体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以及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为此努力的体制安排。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谭琳、蒋永萍，2006）。

在中国，虽然“男女平等是一项基本国策”，许多法律法规对于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方面的权利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还是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这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的性别制度和规制始于西周初周礼的制定，其核心的内容是性别分工、婚姻家族制度和继承制度（杜芳琴，1998）。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典成为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的理论依据，儒家文化的父权制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家庭制度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和制度的总和组成了儒家文化的父权制度结构（李冬莉，2000）。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传统文化导致了中国农民的生育选择以追求男性后裔为目的，因为中国人“最初和最终的责任，是对祖先和后代尽力”（许琅光，1990）。由于男孩所具有的经济功能、社会文化功能和宗教功能使男孩对家庭和家族的效用比女孩大得多，所以中国的性别歧视具体表现为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

对女孩的歧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包括忽视、投资不足、过度惩罚、遗弃，以及极端情况下的溺弃女婴等现象，导致女婴和女童的相对较

低的存活机会 (Waldron, 1987)。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伴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急剧转型, 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使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由于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生育观念之间发生冲突, 随着以 B 超为主的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可实现性, 中国的父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为获得理想的子女规模和性别构成的途径, 已从溺弃女婴逐渐转变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目前,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孩的歧视在人口学上的表现, 就是持续上升的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性婴幼儿死亡水平。

出生性别比 [Sex Ratio at Birth (SRB)] 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 是活产男婴出生数对女婴出生数的比值。国际上, 一般以每出生 100 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研究表明, 地理区域、种族、生育孩次、生育父母亲个人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口的出生性别比, 但出生性别比却有一个正常范围。从国际经验来看, 正常范围在 103 ~ 107, 即每 100 个女婴对应 103 ~ 107 个男婴。高于 107, 则有可能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 1980 年代以来持续升高。在 1980 年代以前,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属于正常范围。但是, 随着 1980 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中国 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 1982 年的 108.5 上升到 1990 年的 111.3, 2000 年又继续上升到 119.9, 已经远远高于 103 ~ 107 的正常值 (Liu, 2004)。总体偏高的同时,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还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孩次差异, 这综合反映了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偏高的女性婴幼儿死亡水平是性别歧视在人口学上表现的另外一个方面。正常情况下, 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婴幼儿 (0 ~ 4 岁) 死亡水平表现为男性婴幼儿死亡水平应高于女性, 而世界各国长期的经验统计也表明男孩对女孩死亡水平比值通常大于 1。若一个人口中观测到的男性和女性婴幼儿死亡水平之比低于这个比值, 则说明这个人口中存在“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

中国自 1950 年代以来一直存在偏高女孩 (1 ~ 4 岁) 死亡水平问题, 而 1980 年代后女婴 (0 岁) 死亡水平偏高程度急剧上升, 性别歧视从 1 ~ 4 岁女孩转向女婴。1 ~ 4 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 10%, 农村已经是儿女双全的父母再生育的女孩, 其死亡率要比如果她是男孩的情况下高 50% (Choe et al., 1995)。而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 女婴死亡率明显高于男婴: 城市的男婴死亡率为 8.61‰, 女婴死亡率为 10.69‰, 性别比为

0.81；乡村男婴死亡率为 28.28‰，女婴死亡率为 41.16‰，性别比为 0.69（李树苗等，2005b）。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是伴随着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率的下降而持续上升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生育观念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当数量和性别不可兼得时，在有可能产前确定性别时，农民会选择以较小的心理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子女性别期望，导致农民的生育意愿从“多子多福”转变为追求生男，即在少育中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Gu and Roy, 1995；Croll, 2001）。中国的父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为获得理想的子女规模和性别构成的途径，已从溺弃女婴逐渐转变成性别选择性流产（Coale and Banister, 1994；Lavelly et al., 2001）。人工流产和出生性别比时间趋势和变化模式的一致性，揭示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实现男孩偏好的主要途径，对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具有重要影响（韦艳等，2005；Zeng et al., 1993；Gu and Roy, 1995）。局部地区的数据分析表明大于 25% 的女胎以流产告终，而男胎被流产的比例只有 1.6%（Chu, 2001）。李涌平（1993）曾经用定量的方法说明，用胎儿性别鉴定后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可以全部解释我国 1990 年观测到的超常出生婴儿性别比。在没有生育控制时，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只会在曾生子女都是女孩的第四、五胎以后才出现，但在有严格生育控制时，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在头胎是女孩的二胎生育中就出现了，这在根本上与普遍存在的男孩偏好有关，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加剧并提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解振明，1998；Banister, 1995；Gu and Roy, 1995；Poston et al., 1997）。

偏高女孩死亡水平在东亚、南亚、北非和西亚等男孩偏好比较强烈的国家中普遍存在。就中国而言，由于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相对偏高女孩死亡水平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新中国建立后，这个问题有所弱化。但自 1980 年代以来，在低生育率的环境下，男孩偏好观念有所强化，女孩偏高死亡水平问题加剧。由于女孩处于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缺少自我保护能力，她们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和社会和家庭。家庭因素对儿童生存风险的性别差异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偏高女孩死亡水平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它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父母与家庭中，但只有女儿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过多女孩死亡现象，没有男孩的家庭中的高孩次女孩死亡风险更高。

死亡儿童在疾病治疗保健措施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是导致偏高女孩死亡水平的重要原因。在男孩偏好影响下父母对孩子疾病严重性的认识存在性别差异。在生病后没有看过病的死亡儿童中，女孩远多于男孩；女孩

的疾病容易被忽视。男孩在寻医和治療措施等方面，经常占有更多资源，父母在为生病儿童寻求更高质量的治疗措施方面，男孩的待遇要显著好于女孩（李树苗等，1999）。男性和女性婴幼儿对医疗保健的可得性不平等是导致偏高女性婴幼儿死亡水平的主要原因（Croll，2001）。

在很多国家都能发现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偏高女孩死亡水平的情况。目前在性别歧视较为严重的中国、韩国和印度出生性别比都偏离了正常水平，而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和西亚及北非等国家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问题突出。这些国家的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这综合反映了女孩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男孩偏好。

第二节 人口社会后果

20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追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关注社会全体成员，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中国，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多种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法规和条例，但女性无法与男性平等地享有法律、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利，女性在资源的享有和利用、经济机会、权利和政治言论等方面与男性存在着巨大差距，实际生活中侵犯妇女特别是女孩权益的事件多有发生。而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说明中国女性在生命历程起点阶段就受到歧视，本应出生和存活的女性消失，这损害了妇女和女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也严重损害社会与人口的整体福利，并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影响中国人口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首先，性别歧视表现为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必然伴随着性别选择性流产、溺弃女婴等，导致女性缺失和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这种现实中对女性的歧视，导致女性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引起了数量庞大的“失踪女性”现象。

中国农村男孩偏好普遍存在，近年来不断强化并呈现出高度选择性的特征。出生性别比大幅度上升，并且随孩次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前有子女为女孩时，出生性别比的值更高，表明了男孩偏好程度的不断强化（Zeng et al.，1993；Park and Cho，1995；Poston et al.，1997；Banister，2004）。生育

政策强化了男孩偏好，男孩偏好对人工流产有重要的影响，提高了妇女人工流产的风险。女性承担着繁衍人类的特殊使命，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使女性往往不是生育权的主体而是生育的工具。在决定是否生育、生育子女的数量等方面，男子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常常要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牺牲自身健康为代价来满足男性对子女性别选择的需要，她们身心都受到了巨大伤害，影响了生殖健康（马焱，2004）。

人工流产引起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和对女性的歧视引起的偏高女性死亡水平，导致了中国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为了度量性别歧视引起的女性缺失，Sen（1989，1990）提出了“失踪女性”的概念。比较一个实际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和另外一个在正常出生性别比和性别中性死亡水平假设下的模型人口，如果实际人口的性别比超过了模型人口的性别比，那么为了匹配模型人口性别比而缺少的那部分女性人口，就可以看成是估计的“失踪女性”数量（Klasen and Wink，2002；Cai and Lavelly，2003）。Klasen 和 Wink（2002）根据 1990 年普查数据，估计中国历年出生队列留存到普查时点的失踪女性为 3460 万人，失踪女性的比例为 6.3%；根据 2000 年普查数据估算失踪女性 4090 万人，比例达到了 6.7%。而 1980~2000 年出生队列在 2000 年普查时点真实失踪女孩的人数为 850 万人。

其次，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急剧转型时期，人口本身产生了很多问题。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就业、老龄化、婚姻挤压问题等引起了广泛关注。性别失衡和“失踪女性”影响了中国的人口发展进程，并对人口发展中的这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总量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总体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预计这种增长的态势要持续到 21 世纪 30 年代中期（袁建华等，2003；李树苗等，2006）。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日益紧张，中国人口承载力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且对规划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而根据众多专家、学者及有关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研究中国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认为中国人口在 7 亿~10 亿人之间比较合适（蒋正华、张羚广，1991；顾宝昌，1998；袁建华等，1998）。中国的性别歧视引起的“失踪女性”降低了中国人口总量规模，长期来看性别歧视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不可低估（李树苗等，2006；Cai and Lavelly，2003），使中国的人口总量更快地趋于适度人口总量，对降低人口总量、缓解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缓解作用是以牺牲女性的出生权和生存权为代价的。

性别歧视不仅降低了中国的人口总量，而且降低了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目前，中国的就业缺口较大，形成了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叠加，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虽然在数量上迎来了难得的“人口机会窗口”，但是如何把“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提倡的就业优先，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从总体上损害了企业的效率和公平，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性别歧视减少了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而且从长期来看减少的规模不容忽视，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而从长期来看，性别歧视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根据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4.9%增长到2000年的7% (Lavelly, 2001)。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还未能建立可靠而又完备的老年保障体系。对中国农村绝大部分老人，目前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为老年生活建立足够的储蓄 (于学军, 1995)。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加快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步伐，但显然未来很长时期内，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的主体形式。性别歧视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显然给中国并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一系列难题。

“失踪女孩”引起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导致男性“婚姻挤压”。如果婚龄男女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将导致一部分人口难以按现行的标准择偶，这一现象即是“婚姻挤压”。中国目前以及今后都面临可怕的女性短缺，每年将新增数以百万的在本国找不到配偶的年轻男性 (Tuljapurkar et al., 1995; Das Gupta and Li, 1999; Poston and Glover, 2005)。“婚姻挤压”除了给年轻男性带来婚姻压力之外，还会导致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双重的婚配竞争、单身未婚者本身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问题、婚姻及家庭的稳定性问题、非婚生育与私生子问题、独身者的养老问题、色情业和拐卖妇女等问题，危害社会稳定，必将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安全问题，阻碍社会可持续发展 (陆杰华和傅崇辉, 2004; 宋健等, 2005)。

2004年，Hudson和den Boer出版了《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 (*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一书。该书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对女性的歧视，讨论了中国男性人口的过剩。并且，该书将男女性别比例与安全问题结合，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